

《中國是一部善惡交結的歷史》

(二)美國的大氣與寬容

你要到歐洲去,再去美國,你會發現一個重大差異:歐洲早晨大街上沒有什麼人,而美國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,甚至全天如此。我有句言論:健身是一種品質。健身代表一種蓬勃向上的文化。一個國家有沒有朝氣,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。美國人可以把國旗當褲衩穿在身上。我在美國買過一條星條旗褲衩。我常穿。我穿它是為了蔑視它,是出氣,是一種心理的渲泄和滿足。美國人穿則是一種調侃。本質不同。美國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燒自己的國旗。戴旭(作者朋友,《空軍軍事學術》編輯)說:如果一個國家連自己的國旗都可以燒的話,你還有什麼理由去焚燒它呢?

(三)精神和道德的偉大力量

這是最可怕的,“911”是一場災難,當災

有相當一批美國人自發地組織起來,到阿拉伯人的商店、飯館為他們站崗。到阿拉伯人居住區巡邏,阻止悲劇的進一步發生。這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啊。我們自古就有報復的傳統。我住在成都。鄧艾破成都後,龐德的兒子把關羽一家老幼全殺光了。血腥報復,斑斑點點,不絕于史籍。

第三件事,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墜毀的那架767客機,本來是要撞向白宮的。

後來機上乘客與恐怖分子搏鬥,才使飛機墜毀。因為當時他們已經知道世貿大樓、五角大樓被撞的消息,他們決定,不能無所作為,要和恐怖分子進行殊死鬥爭。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,他們還做了一件事:決定投票通過,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鬥爭。在這麼一個生死攸關的時刻,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強加給別人。後來全體同意,才去與劫機者搏鬥。什麼叫民主,這就是民主!

民主的理念已經深入到他們的生命中、血液里、骨髓中。這樣的民族,他不興盛誰興盛;這樣的民族,他不統治世界,誰能統治世界。我常作奇想:世界最尖端的武器、最新的科學技術、最強大的武裝力量,掌握在這些人手中,還是挺合適的。總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強吧,總比掌握在利比亞、伊拉克人手中強吧?就是掌握在我們手中,我們能做出些什麼,也未可知。

美國這個國家有很多成功的經驗,值得我們學習的借鑒。“911”事件後,美國沒有成立“911”委員會,沒有成立什麼應急指揮部。我非常反對不實在的東西。我到成空以後,要麼不開會,要麼就少開會。非開不可的會,開短會。我來成空,首先就把常委學習改成自學。拿着文件念,學習的什麼呀。

我在同習慣勢力抗爭。我個人力量有限,但我不能不抗爭。哪怕碰得頭破血流也不氣餒。比方說我一般在部隊不吃飯,只要一天能回來的,我都帶著乾糧,我不吃部隊。我到三十三師,在北空也是這樣。如果不得不吃,我只吃簡單的。雖說一兩酒喝不倒紅旗,一頓飯吃不垮江山。但是太多了,太浪費了,積少成多,就難說。

研究美國,我們應把握它真正的內涵。不能光看小的,要看大處。有一句話說的好:經常議論別人的缺點,你就是一個道德水準低下者;經常議論人類的缺點,你就是一個思想家。



劉亞洲:習近平主席說,歷史是現實的根源,任何一個國家的今天都來自昨天。甲午戰爭是一場深刻影響和改變了兩個國家命運的戰爭,這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,一個是日本。再往大處看,它還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世界歷史。當然,受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。對中國而言,這場戰爭的歷史深刻性在於兩點:一,戰爭失敗了,但失敗的原因至今仍在追問之中。二,戰爭雖然早已結束,但戰爭的傷口並未癒合,仍然橫亙在歷史和現實之間。對這場戰爭疑問的解答,構成了我們民族進步的階梯。從這個意義上講,甲午戰爭已成為一種標誌、一個符號。

甲午戰爭日本的勝利是制度的勝利。大清帝國的失敗是制度的失敗。鴉片戰爭一聲炮響,在喚醒了清朝的同時也喚醒了日本。中日兩國同時走上了“改革開放”的道路。但這兩個國家學習西洋文明,一個從內心革新變化,另一個則止於外形。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飯吃,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衣穿。當飯吃的消化了,強身健體;當衣穿的只撐起了一個模樣。福澤諭吉說,一個民族要崛起,要改變三個方面:第一是人心的改變,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,第三是器物的改變。這個順序絕不能顛倒。如果顛倒,表面上看是走捷徑,其實是走不通的。日本就是按照福澤諭吉這個順序走的,而清朝則反着走。結果一個成功了,一個失敗了。德國“鐵血宰相”俾斯麥曾分別接待過中國和日本兩個代表團,後來有人問他對中日的看法,他指出,中國和日本的競爭,日本必勝,中國必敗。他說:“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,講究政治原理,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;而中國人到歐洲來,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,價值如何,買回去就算了。”

19世紀中葉,中國發起洋務運動,經歷了30年的軍事改革,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脫胎換骨的新式海軍和陸軍,但它的軍事變革是失敗的,主要是觀念落後,制度落後。正如

車爾尼雪夫斯基評價彼得大帝改革那樣,“大鬍子剃掉了,德式西服穿上了,但是留大鬍子,穿舊式服裝時期的那些思想去留下了”。清朝的軍事改革從根本上沒能擺脫農耕文明的桎梏。農耕文明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天下太平,有飯吃就滿足,它的眼睛是向內而不是向外看的。北洋水師雖然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鐵甲艦,卻是一支農民的海軍。

當時清朝主張“中學為體,西學為用”。中國古代的文明太燦爛了,反而成了我們的包袱。日本從來不是領導世界歷史文明潮流的國家,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時能夠輕裝上陣。況且日本是個愛學習的民族,誰強就跟誰學,而且學得有模有樣。二戰結束後,東京的廢墟瓦礫還沒有清除乾淨,裕仁天皇就簽發了向美國派出留學生的詔令。所以,明治維新短短30多年時間,便把日本變成了一個現代國家,並不讓人驚訝。日本與清朝的對決,是一個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的對決。清朝怎么能贏?

當時日本成爲一個現代國家最主要的標誌是人的覺醒。日本沿襲中國文化上千年,其國家形態與它的文化母國是一樣的:國不知有民,民不知有國。那時候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和日本來,都一致承認中日兩國人民的忍耐和堅韌無與倫比,但另一個印象就是麻木不仁,對壓迫逆來順受,毫無主動性和創造性。日本有本侮辱中國人的書叫《支那論》,說中國人“似蚯蚓這種低級動物,把一段身子給切斷了,其他部分沒有感覺,仍能繼續活着。”其實以此來形容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人,也不差分毫。但西風東漸之際,日本人斷然斬斷了上千年的文化臍帶,脫亞入歐,加入了西方的發展行列,人民變成了國民。

百姓是不是國民,有兩條重要標準,一是有沒有權利,二是有沒有財富。在明治維新的時候,日本還搞了“自由民權”運動,其核心是“納稅的民衆政權”。大久保利通說:“國家強大源於民衆的富足。”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務運動相反的路,鼓勵民間資本。而清朝腐朽的制度不僅阻礙了民族發展,為敵國入侵提供可能性,並在關鍵時刻出賣民族利益。甲午戰敗後賠了那么多錢,可戰前買軍艦,竟一分也掏不出來。有了國民,就有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國家。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甲午戰爭經驗時都認為,國民意識是戰爭勝利的最大寶藏。

劉亞洲:甲午戰爭中國失敗是制度的失敗



難襲來時,最先倒下的是軀體,但站的是靈魂。有的民族逢災難,軀體未倒,靈魂已繳械。“911”事件中發生了三件事,都可以讓我們從中看到美國人的力量。

第一件,世貿大樓頂部被飛機撞擊之後,烈焰奔騰,形勢千鈞一髮。

樓上的人們通過EXIT向下逃生的時候,並不特別慌亂。人往下走,消防隊員往上沖。互相讓道,並不衝突。有婦女、小孩、盲人到時,人們都自動地讓出一條道來,讓他們先走。甚至還給一條寵物狗讓道。一個民族的精神不強悍到一定的程度,斷然做不出這種舉動。面對死亡,冷靜如斯,恐怕不是聖人也接近聖人了吧。

第二件事,“911”的第二天,世界就知道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為。

很多阿拉伯商店、餐館被憤怒的美國人砸了。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襲擊。這個時刻,

劉亞洲簡歷

- 1968年3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,任陸軍第63師步兵187團2連戰士、副班長、班長、排長,團報道組報道員。
- 1970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
- 1972年在武漢大學外語系英文專業學習,1975年畢業,在民航北京管理局(首都機場)宣傳處工作。
- 1979年任空軍政治部聯絡部1處干事。
- 1984年底任中國作協理事。
- 1986年任空軍政治部文化部文藝創作室副團職創作員。
- 1986年5月-1987年為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。
- 1987年回國後立3等功,任正團職創作員。
- 1988年8月任中央軍委辦公廳政治部副師職干事。
- 1990年8月任總參裝甲兵裝備技術研究所政委、黨委書記。
- 1993年1月任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副主任。
- 1997年任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。
- 2002年1月任成都軍區空軍政委。
- 2003年12月任空軍副政委兼紀委書記。
- 2009年12月任國防大學政委。
- 在中共十七大大上當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。
- 1988年8月被授予空軍中校軍銜。1993年晉陞為空軍大校軍銜。1996年6月晉陞為空軍少將軍銜。2003年晉陞為空軍中將軍銜。2012年7月30日晉陞空軍上將軍銜。
- 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。198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。
-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。

相關資料

在中國軍界,國防大學有“中國軍隊將官搖籃”之稱,日前,劉亞洲中將接替已調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原政委、海軍中將童世平,出任國防大學政委、黨委書記,官居大軍區正職。劉亞洲在海內外頗受矚目。本世紀初,劉亞洲有關中國文化傳統、軍事謀略的一些觀點、演講稿廣為流傳于網絡,掀起網絡論戰的滔天大浪。

“與其他同志相比,我只是有點鋒芒而已。”劉亞洲如此說。

劉亞洲在空軍副政委任上已近5年,此次“他的任職,反映了中國軍隊對戰略家的重視,這是一支軍隊戰略文化興盛的標誌。”海外媒體這樣評論說。

“筆桿子”出身

在和平年代,身為軍人的劉亞洲橫空出世,靠的不是槍桿子,而是筆桿子。

劉雖官居高位,卻厭惡文山會海,不喜迎來送往,平生最好兩件事:深入部隊和研究軍事戰略。

他在《金門戰役檢討》一書中談及金門戰役失利,以“勝利有一百個父親,失敗是一個孤兒”來比喻這場戰役以其慘敗而始終無人“認領”責任;“沒有哪個內部材料和軍事教科書上有這樣生動豐富的語言”,一位軍內人士表示。

而在20年前,劉亞洲便以獨樹一幟的戰爭報告文學聞名,其作品不僅成爲當代文學史上的名篇,有些還作爲軍校演兵習武的教材。

當年他在成都空軍和北京空軍任職的時候,下基層演講或在軍隊一些高級幹部培訓中講課,常常論古談今,一說就幾個小時。有關人士告訴筆者,劉治學著述嚴謹,記憶力超強,大段的中外名著能背誦如流。他的英語水平可以拿起外文報刊直接閱讀。

文集風波

經歷“劉亞洲文集風波”的一位當事人告訴筆者,當時空軍搞軍事學術研究的人士,專門收集劉亞洲多年來的數次內部演講錄音整理成稿,編輯成一套三冊的《劉亞洲戰略文集》,每冊多則三四篇,少則一兩篇。

最初印刷發行的本意是在軍內高層傳看,只是內部資料,從未公開發行,也沒有正式書號。文集第一次印刷發放後,劉亞洲獨特的軍事戰略思想在高層將領中很受歡迎。在沒有任何硬性指標要求下,空軍系統高級幹部幾乎人手一冊,最後竟至供不應求,只能再版。有基層軍官也設法從上面搞到一套文集,爭相傳看。

因爲需求很旺,第二次印刷增訂本時,編者特意收集了劉亞洲之前的一些軍事論著文章,以期軍內研究人士學術爭鳴。但劉亞洲的這些演講和理論文章很快引起外界的注意,大量文章被人散佈到互聯網的各大論壇,個人博客爭相引用。

劉亞洲以“第五次中東戰爭”爲素材,寫下報告文學《惡魔導演的戰爭》,他以新穎的題材、犀利的筆觸、尖銳的思想,在中國文學界引起很大轟動,甚至引發了一場風波。那段時間里,劉亞洲所寫的一系列以國際軍事鬥爭爲背景的報告

文學,如《那就是馬爾維納斯》、《攻擊、攻擊、再攻擊》等等,都以全球新軍事變革爲背景,為剛剛走上改革之路的中國軍隊開啓了一扇通向世界的視窗,大都成爲了軍事院校的教材。

有人把劉亞洲的一些觀點歸納爲“軍人戰爭選擇論”,在網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。更有人讀了劉亞洲戰略文集的《大國策》,立馬“噴出”劉亞洲有“親美”傾向,舉出的理由是他早年



與夫人在美國留學居住了數年。在網上恣意評判劉亞洲一時成爲很多人的快事。

大膽諫言

劉亞洲言說的範圍還不止於軍事。“腐敗成了中國最大的經濟損失,最大的社會貪污,最大的政治挑戰。”他說,“中國的希望在黨內,黨內的希望在中央,中央的希望在上層。”對官場久刺不止的公款吃喝之風,他曾冷言嘲諷:“有人說打台灣不要用什么新式武器,派幾個公務員上島去,吃喝兩三年,絕對把它吃光了。”

上世紀80年代仗打完後,很多部隊卻在前線駐地鄉鎮賣起了膠鞋、汽油、棉被、衣服甚至勛章,做起了生意,時間長達半年。當時隨隨政採訪團下去的劉亞洲見此,在半路給當時的軍方領導人楊尚昆寫了一封信,諫言:“前線部隊再這樣搞下去,不得了,要出大毛病。”劉亞洲當時只不過是一個營級軍官,他的信震動中南海。楊尚昆批示:“前線部隊,停買軍用品,儘早撤回原駐地。”

劉亞洲一路走來,數度敢言敢行卻安然無恙,令外界猜不透。

來自“紅色家庭”的傳承

劉亞洲的父親劉建德是個1939年參加革命的老八路,曾官至蘭州軍區後勤部副政委,戰功卓著。劉亞洲自小隨父母轉轉浙江、山西、陝西等地。

劉建德後來把劉亞洲送往他的老部隊63師187團“英雄八連”鍛煉。“英雄八連”是由國防部命名的連隊,曾在淮海戰役中狙擊邱清泉兵團,戰後全連僅剩6人。劉建德曾任營教導員,對該連極有感情。1968年,劉亞洲經蘭州軍區特批入伍,不久轉干。從此,劉亞洲開始了軍旅生涯。

作爲“紅色後代”,劉亞洲對父親極具感情。在他的印象中,父親劉建德生命力頑強,與劉建德一個村一起出來當兵的5個農民,都在孟良崗戰役中戰死,“只有爸爸一個人堅強地活着。1970年爸爸視察六盤山陣地時汽車翻進山溝,不過把眼睛戳傷,大難不死。爸爸從未生過病。自1995年在美國犯過一回心臟病後,也一直風平浪靜。”

2000年12月13日,劉建德病逝,當時還在北空工作的劉亞洲如五雷轟頂,在接連7篇的《喪父日記》中不停地剖析、自責,記述了那段異常悲痛的心情。劉亞洲將父親比作高山,而將自己比作塵土。稱父母有泡澡的習慣,但他們爲節約,從來是兩人共享一盆水,“媽媽先泡,不打肥皂,而後爸爸再泡。”

劉建德的勤儉克己,與劉亞洲的岳父李先念極像。劉亞洲的夫人李小林說,改革開放之後,父親李先念有一次在飯桌上對孩子們嚴厲地說:“你們誰要經商,打斷你們的腿!”因此,李家的孩子沒有一個入從事商業活動。

傳統文化的基因牢牢地打在劉的身上打下烙印。北京機關一位人士稱,劉亞洲從1993年到北空任政治部副主任以來,從沒有以個人的名義用公款請過一次客。這種堅持到了一個固執的程度:甚至連空軍司令員、政委到成都空軍檢查工作,他都不宴請。

這種“堅持”的原因,或者可以用劉亞洲在《大國策》中的話來表述:“我們不能選擇是否有個聰明的頭腦,但是我們可以選擇有一個較好的心腸,較好的心腸指什麼?一個人的道德品質。一個人的道德高低也許不重要,一個民族的道德高低就重要了。一個官員的道德高低也許不重要,一個執政集團的道德高低就很重要了。”